

中国在中东：话语与现实

李伟建

内容提要 自党的十八大后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以来，从“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积极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有了明显的递进式转换。其特点是：中国特色越来越鲜明，战略目标越来越明确，话语塑造越来越主动。由此，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中国外交国际话语体系已经被清晰地构建起来，中东外交话语构建也被推上了中国外交的议事日程。中东在持续多年动乱之后，“由乱而治”理应成为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但中东近期发生的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断交风波，再次印证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出地区一些国家依然未能改变陈旧的地缘政治和教派博弈思想观念，以至于难以走出稳定和发展困境。中国未来要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必然要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上着力，这也更加凸显了加快构建中国中东外交话语的重要性。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构建必须体现中国的外交理念，始终坚持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中东外交的话语核心，同时要将其与本地区国家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辩证地关联起来，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地区各国转变思路和观念，摒弃消极负面的博弈冲突意识，形成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地区共识。

关键词 大国外交 话语转换 中东外交 话语构建

作者简介 李伟建，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3）。

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和深刻调整之中，原有国际体系已难以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足够动力，全球治理出现了赤字。曾经是全球化“领头羊”、全球治理主要供给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这方面的意愿

和能力都有所削弱。尤其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公开支持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严重地削弱了国际协定和国际机制的意义和价值。欧洲内部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治势力日益猖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遇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此外，英国因脱欧与欧盟矛盾公开激化，美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对国际政治和世界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聚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来扮演领头羊的角色。”^①

自本届政府提出探索大国外交之路以来，中国外交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快速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提高自身的话语权和规制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也为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增长及完善全球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倡议已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大国外交话语的内涵和特色，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及与之相对应的外交政策，对于解决全球安全特别是地区热点问题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必将对中国的中东外交产生积极影响。

治理和发展是中东地区当务之急，也是中东国家民众的普遍诉求。但是，本地区安全局势依然脆弱不稳，叙利亚危机尚未平息，“伊斯兰国”极端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伊拉克收复摩苏尔之后，提供安全保障、开展战后重建以及帮助伊拉克难民返乡成为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新问题。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反映了本地区不少国家依然陷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冲突之中，而最近再起的巴以冲突也给地区局势增添了新的不安定因素。面对中东现实，中国如何在中东外交中践行大国外交理念？如何在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及宗教文化关系复杂且充满安全风险的地区构建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话语？这是当前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转换

“对于任何崛起中的大国来说，确保和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

^① 郑永年：《中国如何后回应国际的期待？》，载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5月2日。

是很正常的和必要的，而‘话语权’是实现多重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可行途径”。^①自本届政府确立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以来，从提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积极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有了明显的递进式转换。其特点是中国特色越来越鲜明，战略目标越来越明确，话语塑造越来越主动。由此，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中国外交国际话语体系已经被清晰地构建起来。此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世界经济治理的参与度不断加深，承担的责任不断加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也有了显著提升。

（一）从探索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到提出新型国际关系

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②首次正式对外明确了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定位。在这篇演讲中，王毅部长用“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待，也是当代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及“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来说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的背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世界在关注，中国也在思考和探索”。王毅强调中国正在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这条外交之路分5个层面，即：“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植根于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自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以及契合于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王毅部长的这篇演讲体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但从话语构建层面看，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意愿”，即“中国愿意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我们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③它更强

^① 参见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17年6月26日文章，文题是《中国争取国际影响力面临五大挑战》，转引自《环球时报》2017年6月28日。

^② 这一演讲经王毅部长审定后授权《人民论坛》发表在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2013年8月（上），载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n/qikan/2013-07-31/93080.html>，2017-05-18。

^③ 同上文。

调的是“探索”和“中国特色”，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以及中国的外交首先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为维护中国在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王毅在演讲最后部分还具体阐述了包括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以及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等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行动方向和政策目标。总体上，王毅部长的这篇讲话，可视作是中国确立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宣言。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时，首次呼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在联合国讲坛上再次向全世界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①2016年6月20日，王毅部长在《学习时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的署名文章，从目标、基础、原则以及方式，即以命运共同体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以共赢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合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等4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构想。文章还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即政治上逐步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子、经济上推动形成包容性发展的新格局、安全上积极提出维护国际地区安全的新思路、文化上大力开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气象等4个层面，说明了中国推动并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自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②2017年3月20日，王毅部

① 参见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2017-07-25。

②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载《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

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午餐会上发表的题为《共建伙伴关系 共谋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愿与各国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愿本着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思路，与各国建立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① 这是中国正式在世界上提出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努力方向。

（二）中国外交话语递进式转换的要义

从确立“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战略定位到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再到“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我们从话语建构的角度至少可以看到3个层面的递进式转换。首先，从强调“新型大国关系”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现的是中国外交从过去过于注重双边关系，尤其是视大国关系为重中之重，到现在开始从大国外交的视野对21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走向进行思考，并提出中国的看法和思路。这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国外交话语转换，显示了“中国有意识地超越传统的‘对大国外交’，而开始以‘大国’的身份运筹和推进外交”。^② 其次，从“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递进，超越了此前反复强调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同时超越了西方传统理论流派，对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的思考和方案。诚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所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③ 再次，从强调中国的外交首先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的外交必须坚定有力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和拓

^① 参见王毅2017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午餐会上演讲：《共建伙伴关系 共谋和平发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47084.shtml>，2017-07-26。

^②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01/18/content_40127075.htm，2017-07-24。

^③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2017-07-25。

展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①到提出“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的“共赢共享”共同发展理念,将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②超越了传统外交思维模式,充分体现了“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新义利观及大国担当和天下情怀。

综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已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和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架构。它“超越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使中国外交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③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积极践行大国外交,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9月4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前瞻、开创、务实、有效的“中国方案”。在2017年7月7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继杭州峰会后再次围绕世界经济形势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四点“中国主张”:为加强二十国集团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新的贡献。在中国和其他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的作用大幅提升。“这种提升反映在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方面作用由‘虚’到‘实’的转变,反映在二十国集团决策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反映在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提升”,^④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也有了明显提高。此外,中国这些年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朋友圈”不断扩大,至2016年底,中国已经同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

①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n/qikan/2013-07-31/93080.htm>,2017-05-18。

②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2017-07-25。

③ 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4日。

④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梁国勇接受经济日报采访:《中国有效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载《经济日报》2016年9月7日。

的伙伴关系，实现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

（三）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的调适

如上文所述，自确立大国外交战略定位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倡议，已经基本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和话语体系框架。在这一框架推动下，中东外交话语构建被提上了中国外交的议事日程。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的演讲中，将“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①四句话融入中国外交新理念，奠定了中国中东外交话语基础。2016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联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②，习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五大理念，以及“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四大行动。这是继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1+2+3”合作格局的新构想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一次在世界关注的中东地区发展及治理问题上提出中国的话语及中国的思路 and 方案，也为中国中东外交的话语构建指明了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已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获得一定的制度性话语权，但除了经济领域，全球治理还包括政治、安全、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毋庸讳言，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及话语运用能力与西方大国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中国在现有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没有主导性地位，总体而言尚缺乏强大的国际规则话语权，”^③未来将面临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同样，在中东，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构建也面对美国等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中东地区严峻的政治和安全现实的考验。因此，中国未来不仅要提高中国在包括全球经济在内的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争取和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还要通过积极参与解决包括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6/05/content_2694830.htm，2017-06-10。

^② 参见习近平2016年1月21日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③ 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载《人民日报》2017年2月17日。

的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发挥更实质性的作用，增强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持续多年动乱之后，“由乱而治”成为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中国提出的发展和治理理念显然迎合了中东国家的现实需求，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被证明有效地促进了世界局势的总体安全与稳定，发展促进安全的理念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并且，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奉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从长远看，中国可以在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和发展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中东安全局势的脆弱性、地区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中东地区的发展治理依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中国在中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先要对中东局势有精准的判断和把握，中国构建中东外交话语也必须面对中东现实，并与中东国家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中国中东外交既要立足于地区的长期治理和发展，也要更积极地为解决中东各国的政治和安全等热点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唯此才能在推动中国中东外交及参与中东事务中获取话语权。

（一）当前中东局势的特点

受剧烈变动和深刻调整之中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影响，中东地区形势进入中东变局以来的深度盘整之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动荡中持续调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美国等六方与伊朗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为标志。其特点是：美国与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而与伊朗的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中东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动摇，引发地区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各国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带来的新变化。第二阶段从特朗普上台开始，其上台后的一系列言行给中东局势的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特朗普迄今尚未有明确和完整的中东政策出台，但其相关言行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表现为：反恐、亲以、疏伊（朗），这被认为是判断其未来中东政策的重要依据。此外，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更多从利益层面而非从战略层

面构建与地区国家的关系。这让沙特等海湾国家看到了重新确立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希望，特朗普将沙特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访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诱惑，同时在利雅得召开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性峰会，也符合其动员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伊斯兰国家参与反恐的想法。而沙特不惜重金拉近与美国关系，并试图将反恐与遏制伊朗捆绑，目的是为了挽回其在伊核协议签署后与伊朗在地缘政治博弈和地区影响力争夺中的颓势，最近发生的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事件，本质上也是这类博弈的一部分。这种博弈是对中东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变化的必然反应，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受国际和中东地区大势所限，尤其是美、俄等大国中东战略目标旨在保持中东总体平衡，因此，这种博弈基本会在可控范围内。

另一方面，随着“伊斯兰国”加速“由盛而衰”，地区国家渐次进入“由乱而治”阶段，但地区治理困难重重。当前，中东的治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包括战乱国家的战后重建；二是提供安全保障。当前，中东大部分国家都面临这两方面难题。叙利亚内战尚未结束，战后重建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无论是政治重建，还是经济重建，对叙利亚而言都将是新的挑战。伊拉克虽然已收复了摩苏尔，但未来如何确保该地区安全？这也是伊拉克当局面临的严峻现实。埃及这几年经济发展持续不景气，旅游业一蹶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最近发生的几起极端恐怖事件表明，埃及社会正酝酿着新的不安定因素。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国家都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同样问题。

从发展趋势看，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其一，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争斗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或将取代传统的地区热点问题成为影响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及形势发展的主要源头。这样的影响已经体现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悄然改善以及沙特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之中，未来还将体现在后“伊斯兰国”的伊拉克国内政治发展以及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之中。其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中东政策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从其上台几个月的实际情况看，特朗普在具体中东问题上一直是延续性多于变革性。他在巴以和伊核等重要问题上均未采取“颠覆性”行动，在人事任命上，特朗普也逐渐弃用了在中东问题上持激进观点的官员。虽然特朗普访问沙特被认为是在沙特与伊朗的争斗中为沙特背书，但特朗普更多是想向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兜售军火换取实惠，以及推动这些国家参与美国反恐计划。事实上，美国当前在中东的首要

目标是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伊朗问题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点。美国官方近期已明确表示伊朗没有违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虽然美国政府以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为由再次对其制裁，但美国的这种做法已难以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不会对伊朗产生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靠拢，美国未来的中东政策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其三，“伊斯兰国”被打垮是必然趋势，但在一段时期内，地区的安全局势难以改观，甚至有可能发生更多分散性的恐袭事件。只要地区治理不善，国家发展不足，恐怖袭击和极端主义思潮将难以消除。

（二）阻碍中东治理与共同发展的主要症结

近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给了中国非常有利的战略机遇。国际社会盼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特别是气候变化、多边组织、全球安全及自由贸易体系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呼声日高。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自身陷入困境，一定时期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的能力和意愿也有所减弱。这显然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传播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念，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有利于提高在全球治理及发展与安全等问题上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可度。这显然也将对中国推进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中东外交产生积极影响。

但中东近期发生的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断交风波，再次印证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出地区一些国家依然未能改变陈旧的地缘政治和教派博弈思想观念，这实际上成为中东难以走出稳定和发展困境的主要症结。这显然也有悖于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也不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一事件背后，折射的是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宗教影响力之争。这两个国家通常是被认为最有可能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国家。假设两国能够摒弃前嫌、搁置争议、合作发展，则不仅对两国本身发展有极大好处，而且对促进地区稳定也是极大的幸事。从此次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后续发展看，不仅这两个国家依然处于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沙特还拉了许多地区国家出来选边站队，形成新的对抗阵营，而土耳其准备派兵进驻卡塔尔将使事态更趋复杂，并会留下新的冲突隐患，不利于地区稳

定。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矛头直指伊朗；而伊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也被指是沙特在幕后操纵。沙特与伊朗继续互怼，显然会增加中国与这两个地区大国在地区开展多边合作的难度。

中国十分看重的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阿盟的合作机制，但阿盟现在更趋分裂。^①如果说前些年阿盟把叙利亚开除出局，还多少受了当时“阿拉伯变局”的负面影响，但这次阿盟一纸声明就将卡塔尔除名，这种任性随意的处事方式让我们不免对未来中国与阿盟的合作前景担忧。此外，海合会内部的分裂，也必定会增加中国与其自贸区谈判的难度。多年来，中东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一直是影响地区和平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因之一，这种争斗既消耗了中东国家大量的国力资源，也使之错失了許多发展机会。这次断交事件也表明，多年过去，中东一些国家仍未走出内耗的怪圈。

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总体上获得了中东国家的赞誉，中国提出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一系列治理和发展理念也得到了中东国家的普遍认同，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阿盟总部的演讲得到了中东舆论的热烈反响。但是毋庸讳言，中东现实情况与理念的践行还存在较长的距离。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提到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共建“一带一路”行动、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时，首先就指出：“要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②这些话句句切中阿拉伯国家时弊，在阿拉伯世界产生热烈反响，中东舆论普遍认为这些话到了中东问题的要害。但近期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反映的现实是，同属一个文化的阿拉伯国家还要“交而恶”，中东国家之间不仅没有拆墙，还在筑起新的高墙，未解旧恨又添新仇。中东的这一现实显然是对中国中东外交以及中国以推动和平发展为宗旨的中东政策提出的最大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在论及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困难和挑战时，主要担心的是安全局势。事实上，中东国家学者也将安全问题看作是当前中东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深层次看，比安全局势不稳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中东国家陈旧的思想

^① 金良祥：《试析中东地区主义的困境与前景》，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92页。

^② 参见习近平2016年1月21日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观念和已经固化了的看问题、看世界以及看自己的方法。中东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东那么多问题久拖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新思路，或者不愿意接受新思路。以前，我们在与中东国家交往交流时，为了顾及友好关系，往往只叙友谊，避谈问题。中国未来要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必然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只有对问题的认识及在治理理念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才能在参与中东治理和发展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全球治理观下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的建构

近年来，中国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有很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呼声日高。由此，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既需要紧密贴合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又要与地区国家普遍关注的安全稳定有效关联，重点在于促进转变冲突博弈旧观念，形成共同发展新共识，为中国参与中东治理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

（一）正视中东国家对自身发展问题及与中国合作存在误区之现实

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情势极其复杂，也由于长期以来中东问题由美国主导，而中国则采取总体超脱的中东政策，国内政界、学界在讨论中国是否要更多参与中东事务、在中东发挥更积极作用问题时，总体上持谨慎态度。这也导致中国多年来的中东研究更多是围绕美国的政策展开，以至于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甚于中国中东外交。许多论著集中于形势分析和评估，聚焦于地区冲突和动荡，较少讨论中国的中东外交和政策。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在2017年早些时候刊登了东方问题学者凯尔·哈达德-方达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透露出北京的抱负》的文章，他认为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它一直避免直接介入地区冲突，反复强调愿与地区现存的所有政权合作，并不断重申其不干涉内政原则。这种谨慎政策限制了中国影响中东进程的能力，让一些阿拉伯分析人士苦恼，他们认为中国放弃了其作为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责任。这篇文章还称，“在中国政府呼吁提升中国软实力十年之后，关于该战略如何能够融入演变中的中国经济日程，中东已经成为一个试验场，随着中国从全球出口方转变

成为贷款方和投资方，国内外都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参与中东地区事务”。^①

事实上，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被赋予更多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因此，中国在中东面临的已经不是应不应该发挥作用，而是怎样发挥作用、发挥怎样作用的问题。基于学者视角，笔者认为，中东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被忽视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东有关各方都已固化了对那些悬而未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乃至政策立场，较少反思，不愿改变。中东地区近年来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陈旧观念，其中部分原因是地区国家受宗教文化因素限制，改变起来困难重重；其原因还在于：在美国霸权话语的长期影响下，中东从来没有真正形成过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舆论环境。而我们的研究因大部分是就事论事地对中东形势和热点问题跟踪分析，不知不觉也会在中东问题上形成思维定式。中东问题解决需要新思维，中国的中东研究也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同样，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也需要有所创新，当前尤其要将中国外交的新思想、新理念同中东各国的传统利益及对和平安全的高度关切紧密地关联起来。

现以中国在中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例加以说明。2017年5月14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约1500名代表参加。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地区，中东地区只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论坛。当然，其中原因很多。毋庸讳言的是，虽然中东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和热情都在升高，但总体上，这一倡议还未引起该地区国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不少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和认知还是比较狭隘和粗浅，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少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经济援助层面。中东国家大多经历冲突或战乱，现在乱后求治，希望重振经济，有些国家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迫切需要其他国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因此，在这些国家看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单方面提供投资和经济援助的平台。笔者在与中东国家学者就相关议题交流中，听到的也大多是希望中国

^① 凯尔·哈达德-方达：《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透露出北京的抱负》，载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2017年2月2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7年2月23日。

增加对中东国家的投资和援助等想法和意见，一些学者还对中国对不同国家投资金额的多寡不均斤斤计较。但事实上“真正让‘一带一路’有变革性力量的，不仅仅是计划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构成‘一带一路’意识形态框架的新价值观和哲学。‘丝路精神’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①可见，在促进对中国发展理念的认识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二，一些中东国家学者长期受西方观点影响，将安全与发展问题二元对立，认为中国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方面，热情很高，动作很多，但是对其他国际政治和热点问题反应较慢，或者兴趣不大。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只注重能源和经贸关系，不愿为中东安全负责。笔者曾询问一些中东国家学者，为何大部分中东国家首脑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他们虽然不一定知道具体原因，但都认为，中东国家领导人可能更关注的是地区安全问题。显然，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与地区安全的关联度不高。当然，上述情况也与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不甚全面有关。^②其三，虽然许多中东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 2016 年初在访问中东期间提出的“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③的观点，但一遇到具体问题，他们依然会受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所困，觉得“一带一路”太遥远，无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这也反映了中东国家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发展和治理精神对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理解还很有限，或者说还远未从政治家、精英和学者的认识转变成具体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在中东话语构建滞后与不到位有关。在如今“一带一路”的内涵和空间不断丰富和超越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构建起将“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和平发展理念与本地区国家对政治安全的关切及对和平发展的诉求紧密关联的话语体系。

（二）调整中国对中东外交着力点，加大对中东话语权的影响力

当下，中东问题很多，中国中东外交应重点聚焦于三大主题：一是地区国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是地区国家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三是与地区国

^① 爱德华·谢：《“丝路精神”体现中国价值观》，载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2017 年 5 月 24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7 年 5 月 25 日。

^② 李伟建：《“一带一路”视角下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体系》，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5 期，第 82 页。

^③ 参见习近平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2 日。

家共建“一带一路”问题。从话语建构角度，中国需要将这3个层面有机关联，提出具有引领性和建设性的中国视角、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

具体而言，中国需要选择两个外交着力点。首先，作为长期目标，中国应牢固确立中国在中东的外交特色和重点。如果说美国过去主要是依靠向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提供安全类的公共产品来确立其全球事务主导地位的话，我们未来可以向中东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发展类国际公共产品，以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已经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都是这一类公共产品的一部分，“一带一路”本身是一种发展机遇，在共建过程中还会衍生出更多的公共产品，它同时还应被视作中国向中东地区提供的“治理方案”。中国在中东的话语构建必须紧紧围绕促进地区治理这一主题来展开。对此，笔者曾提出要將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提出的促进地区治理和发展话语紧密关联，同时要将其与本地区国家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辩证地关联起来，将“发展和治理”与稳定地区局势，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等方面的话语有效地关联起来。从中东的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当前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改变观念和创新思路等要素考虑进去，要将中东国家对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中国理念的认知引领到提供发展和治理来改善地区经济和安全环境的视角，提升到中国提供发展思路的高度，而非简单的提供经济和物质援助。作为主动塑造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话语，中国要持之以恒地通过各层次尤其是国家机构和智库间集中和密切的沟通交流，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地区各国转变思路和观念，摒弃消极负面的博弈冲突意识，争取在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发展不足、治理不善这个认识上形成共识，进而推动地区共同发展。

其次，鉴于中东各国依然将地区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利益关切，中国当前仍需要更积极的实质性地参与中东的安全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尤其要在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也门和苏丹等热点问题的国际机制中增强存在感。在参与过程中，既要强调国际合作，更要发出中国的声音。比如，在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中东安全的议题上，要突出“发展”对于稳定地区局势的重要性。我们要摆脱长期以来西方将安全与发展问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确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辩证阐述两者关系的中国话语。为“以促进各国发展来实现地区稳定，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土壤”为重点的中国中东外交理念和政策奠定扎实的话语基础。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等中东争端问题上，有关部门及研究机构

要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在关键时刻提出中国的思路与方案。在涉及该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地区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体上要超脱于地缘政治博弈旋涡,开展以我为主的大国外交,在坚持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既有原则基础上,积极劝和促谈,绝不选边站队,不应为所谓支点国家的固有概念所束缚,而要与理解并认同中国发展理念,愿同中国发展紧密关系的国家开展深度合作,加强对双边关系投入,^①以期产生溢出效应,对周边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结 语

当前,中东安全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诸多热点问题悬而未解,各国发展不平衡、政治诉求和安全关切重点不一,这是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现实,在依然存在着地缘政治博弈和教派冲突等传统冷战思维的中东地区,中国近年来提出的许多新的外交理念或许一时还难以引起那些仍陷于冲突困境不能自拔的国家的重视。但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是当前中东各国普遍的需求和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摆脱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冲突与战乱的唯一出路,只有地区秩序和国家治理改善了,中国以推动地区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为主旨的各项政策才能顺利推进。因此,中国的中东外交要着眼于长远,充分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一以贯之地推进以发展和治理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坚持发展促进和平和安全的理念,积极提供发展类的公共产品。中国的中东外交话语必须紧紧围绕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大国外交话语来构建。同时,要凝聚本地区有意致力于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力量,通过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扩大中国推进发展理念的社会基础。此外,中国要通过持续地与国际和平力量合作,更实质性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机制,适时倡议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并在其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争取在中东事务中提升和增强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制权,为更好地在中东确立中国的外交理念创造舆论环境和历史条件。如此久而久之,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建设性的和平力量,一定会取得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取得引领地区发展的影响力。

^① 李伟建:《中国中东外交战略构建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页。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Discourses and Reality

Li Weijia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uring which China proposed to carry out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has progressively converted from exploring the path of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onstructing new – ty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win – win cooperation, then t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 type partnership, with more distinctive features, clearer strategic goals and more active discourse shaping. Therefor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discourse, with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in – win cooperation as its core ideas, has been clearly constructed. Against such backdrop,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on the Middle East has also been put on the agenda. After years of turmoil, transforming from chaos to governance should be the urgent priority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However, the diplomatic crisis between Qatar and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Saudi Arabia once again verified the complexities in geopolitics and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t also demonstrated that outdated ideas on geopolitics and sectarian game theory still exist and stand in the way of region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eeding u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on the Middle East.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on the Middle East must reflect China’s diplomatic ideas, and always make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its cor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also associate itself with real problems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ultimate goal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on the Middle East is to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countries’ ideas, so as to prevent negative game conflicting theories, promote positive cooperation and reach regional consensus on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Discourses Conversion; Middle East Diplomacy; Discourses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